

开放丛书·思想文化系列

(美)E·哈奇著 黄应贵 郑美能编译
张纪新 张 莉校

人与文化的理论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人与文化的理论

〔美〕E·哈奇 著
黄应贵 郑美能 编译
张纪新 张莉 校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人与文化的理论

〔美〕E·哈奇 著

黄应贵 郑美能 编译

张纪新 张 莉 校

责任编辑：王晓明

封面设计：贺新路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125·插页2·字数230千

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16-0392-6/G·327 定价：3.50元

（取得重印权 限国内发行）

出版说明

《人与文化的理论》系美国学者E·哈奇(Elvin Hatch)所著,经黄应贵、郑美能编译后成为台湾地区一本大专用书。

本书介绍了世界上十位主要人类学家及其理论观点,他们是泰勒(Edward B. Tylor)、博阿兹(Franz Boas)、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克罗伯(A. L. Kroeber)、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怀特(Leslie White)、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布朗(A. R. Radcliffe Brown)、伊凡普里查(E. E. Evans Pritchard)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这十位人类学家大都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以来居人类学领导地位的学者,是人类学各个流派的奠基人。

本书就十位学者对于人类行为截然不同的解释,指出了他们之间阐释上的差异和对人类事件意义的不同认知,从多种形态和各个层面上提出了人与文化的各种概念。尽管书中也存在着如怀特“唯独仰赖周期性的世界大战解决失业、生产过剩以及过分供应市场”这样的观点,但是,它仍然可以为我们了解人类学史和人类学理论提供借鉴。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反理性主义的兴起 ——泰勒与博阿兹.....	(12)
第三章	文化整合中从非理性到功利主义 ——本尼迪克、克罗伯、斯图尔德与怀特... (73)	
第四章	社会的超然性 ——杜尔克姆.....	(160)
第五章	人类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布朗与伊凡普理查.....	(209)
第六章	文化与人类的基本性格 ——马林诺斯基.....	(263)
第七章	结论.....	(326)

第一章 导 言

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成功或失败，经常取决于研究者对某些关键名词、当地意义的掌握，同样，对于历史的观念研究也是如此。20世纪的人类学所要了解的最基本名词之一便是文化。虽然该名词曾在无数的书籍与文章中被讨论过，但在使用上它仍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人类学家经常未加留意地以迥然不同的观念来使用这个名词。对某些人来说，文化是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良好适应工具，而其他人则心照不宣地认为它实质上是独立于生活的急需面，并几乎是随意地依这些而改变的。有些人将制度受社会成员主动地使用与操纵看作理所当然；而其他人认为文化背后的支配原则位于个人所掌握不到的一个层次里。有些人坚持文化在现时的条件上生根，而还有其他人认为它是历史偶然事件的产物。

一个与文化概念密切相关的题目是有关人性的问题。文化需要行为，因此，一学者对风俗的概念便隐含着他所采用人类形象的意义。人类学里对于一个人的本性，尤其是文化如何影响或转变他，有着基本的分歧存在。有些人将个人看作是几乎完全受他的文化环境所塑造出的无定形的群众（Mass）；有些人则视个人受种种需要与内驱力束缚，虽可

经由文化来满足，却无法将其改变；还有其他人则将个人视为是自我中心与情绪型的，且随时需要道德的约束。

在本书中，我将研究对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有极为卓越贡献的十位人类学家的著作，以揭示他们所采取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形象。我的目的是要对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提供一个了解。另一方面，也希望告知非人类学者我所相信的这个学科内某些决定性的问题。人类学往往被认为是专注于琐碎和神秘的事物，诸如传播的路线，或遥远而少为人知的社会所使用的亲属称谓。我将试图指出，极为重要的问题经常都蕴含在看似无关紧要的讨论里。另一方面，也希望增进人类学家的自觉，以及对他所从事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一个人类学者所采用的文化观念与人类形象对他的学术工作是最基本的。

对于我所要做的这种分析仍有不少可讨论的余地，但首先我必需对所讨论的学者加以介绍。

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大多数欧洲历史中，对异族文化的民族兴趣较少，也极少思考对其他不同生活方式作系统的研究。然而，这种冷漠与轻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逐渐消失，因为随着欧洲探险与拓展的自然发展，于是对于“奇怪”与“陌生”的风俗，以及对那些看起来，乃至闻嗅起来不同于家乡本土的民族渐增好奇心。虽然如此，人类学这门学科本身却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当首批的专业学者出现之际才诞生的。稍晚，约当19世纪末二三十年间，才有几位人类学者开始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与博物馆接受任职。

几乎直到本世纪初才设立研究生课程；人类学者得以在范围大小不同的田野从事勘察，并收集他自己所需的资料，制度也大约在同一时期确立。总而言之，19世纪的末四十年可称为是这门新学科的发轫期。

人类学发端时期伟大杰出的人物之一就是泰勒。英国人泰勒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而1883年他接受牛津大学的任聘时，便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术界人类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方法构成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理论，这确切地代表了笼罩着19世纪英语系人类学者的那种思想方式。

泰勒的概念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无疑，似乎是守旧过时的。现在读他的著作主要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尽管如此，了解他的思想，对于现代有关文化与个人观点的充分认识，以及对于20世纪主要受到类似于他的概念的影响下所发展的理念架构，是重要的。第二位我所要讨论的博阿兹的业绩，即说明了这样的辩证过程。

博阿兹为德国人，但在19世纪80年代移民到美国。他于19世纪9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人类学系，随即成为美国该学科的中心。博阿兹通常被公认为美国人类学的创始者。他的研究若单独视之，似乎是乏味而神秘的，但若置于本世纪初，人类学思想所发生的变迁内涵上来看，则意义重大。他的概念属于社会科学，有时被称之为反理性主义运动，而他的文化观念可看作试图建立有关人类事务的性质与意义的新定义。

博阿兹奠定了许多美国人类学思想的基础。我所讨论的

以下四位学者就是建立在他的某些关键性概念的基础与修正之上的。如此，他们贡献了这门学科在美国日益增加的分歧与差异性。第一位为本尼迪克。她是博阿兹的学生，后来也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本尼迪克对于祖尼（Zuni）、瓜求图（Kwakiutl）与多布（Dobu）族的描述是人类学者所曾做过最有名的研究之一。第二位是克罗伯，他在1896年跟博阿兹主修他第一门人类学课程。五年之后，克罗伯于1901年在博阿兹指导下荣获博士学位，而成为这门学科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下一位我讨论的学者是斯图尔德，他是克罗伯的学生，其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广泛的激励了人类学调查。第四位是怀特，他在纽约与芝加哥受教于几位博阿兹的杰出门徒。虽然怀特看不出他自己与博阿兹思想间的连续性，但他所采用的文化观念与人类形象，可视为是对博阿兹某些最基本概念的引申发展与修正。

下一位列在我名单上的人物是杜尔克姆，他与博阿兹是同一时代的人。杜尔克姆先后在波尔多（Bordeaux）大学与巴黎大学（The Sorbonne）教教育学与社会学。他是法国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其影响所及广至法律、历史、经济与考古学等不同领域。杜尔克姆的研究，和博阿兹的一样，可视为对于19世纪某些人类事件性质观点之反动，在理论设计上，他发展出某方面类似于博阿兹，而彻底地与泰勒观点对立的有关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看法。

约1909—1910年间，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类学者布朗，偶然读到了杜尔克姆的著作，他迅即成为杜氏忠实的支持者。他在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大学教书，其中以开普敦（南非）、

悉尼、芝加哥与牛津等大学最为家喻户晓。大约在1925年以后，布朗帮助确立英国人类学的方向，他的影响，虽然较不具决定性，但也达及美国。

另一位追溯其知识根源到杜尔克姆的杰出英国人类学者，即本书第九位所要探讨的伊凡普理查。伊凡普理查在20年代中期开始在伦敦政经学院研读人类学。从那时起，他在非洲与英国兼有几个教学与研究的职位，并在1946年被选为承继布朗在牛津大学荣誉讲座之职。最后伊凡普理查臻于称之为唯心论的文化、社会与人类行为的观点。他的著作对传统上支配着英国人类学的实证主义，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不同选择途径。

最后一位要讨论的是马林诺斯基，波兰人，1910年旅行到英国攻读人类学。不久，他便从事卓布兰岛民的田野研究工作，这个民族由于马氏的著作而名垂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林诺斯基回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任教，一直到1942年他逝世时为止。马林诺斯基在这门学科里是一位权威性的人物，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国学习的每一位人类学者事实上都蒙受了他的影响，而且他的著作也广为受到许多读者的爱好。马林诺斯基的研究法与本书所讨论的任何其他学者比较，具有迥然不同的人与文化之形象。

我选择这些人物时，部分受了时间上的考虑所引导。当然，泰勒被选来提供历史观，因为他的理论架构代表着19世纪末叶的普遍观点。我所探讨的其他理论全都属于20世纪，这里所指的不只是时间上的位置而已，泰勒的理论除外，这

些理论中每一个均代表对人类事件的某些共同假设。譬如说，每个理论均主张文化受人类理性之外的某种东西所统治，人类这种动物更易受情绪而非理性的支配，而且文化主要是建立在情绪的过程之上。即使是博阿兹与杜尔克姆，他们早期的著作跨越着两个世纪的特色，也提出了相当现代的人其文化情境而来。斯图尔德提出一因果的架构，他并从文化生态的决定因素来解释诸如政治组织与财产权的现象。而布朗则是从亲属体系、宗教模式等如何促进这一稳定而凝聚力强的社会角色上来分析的。

不管这些探究法的歧异性如何，每个理论在某方面都是相似的。每一理论至少均隐含提供行为的意义。我所讨论的这些理论不仅阐释某些现象为什么存在，它们如何发展，为什么它们具有某一形式而非另一种形式，以及它们如何行动，而且这些理论也使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行动与制度。

一个假设的例子可用来说明这个意思。假如当我正在一间小阁楼上四处搜寻时，意外发现到一个我从不曾见过的古老机械零件。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惑、一个谜。令人感到困惑的不是该零件如何会到这间小阁楼里，也非那些解释它来源的因果因素。令人困惑的倒是这机械零件似乎难以理解。我决定将它带去给一位古董商，询问他是什么。他告诉我它曾经是一架古老缝衣机的零件。他仅由对该物品的识别，便对它提供了解释。

了解一种文化特质或一种制度是一个相同的过程。如果我在一个原始社会里，观察到一个难以理解的行为模式。我立即开始寻找它背后的意义。或许我观察到一个人守在一些零

碎物品旁边，明显地在喃喃自语。我询问他正在做什么，他说他正在做一个仪式。我开始有了解释。下一步我发现该仪式的目的是要促进他园子里作物的茁壮成长，而且它不过是较大的巫术体系之一小部分而已。我的了解便加深了。而后与文化之形象。

虽然主要着重在本世纪的学者，但我避免论及这门学科最新近的发展。我选择的人物的学术概念均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已臻成熟，或接近成熟。时间提供它自己一个观点，许多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因时序太近，难以达到超然公平的评价。

另一个引导我选择的考虑因素是，希望把重点放在那些在观念上代表着某种差异范畴中的学者身上。我所讨论的20世纪的理论架构，每一个都建立在相同的一套观念中（例如认为人类是一种情绪的动物之观点）但是这些基本的概念常被非常迥异地加以引申解释。结果发展出对人类事件不同的解释。我探讨的这些理论代表着在一个共同主题上的变异，它们构成了有关相同问题的一系列供人选择的不同探究方式。例如，我将区别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人类形象，以及无理性与功利主义的文化观点。

我设法选那些著作本身具有重要性的学者。而且偏好于那些名字甚至在人类学之外也为人熟知的人物，他们在这门学科里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同时其著作中所阐述的问题，我相信具有永久而根本的重要性。

这里所讨论的人类学者，在解释文化现象上，发展出范围

很广的各种探究方式。例如，博阿兹发展了一套历史的架构；他说明一民族的某一文化特质之存在是传自其他地区，而且他解释该特质所具有的独特形式是经由修正以适应我认识到我所观察的巫术仪式扮演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它增强了巫师与那些兴趣于田园里作物生产力的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现在我觉得对这个文化形貌，已达到了相当的了解。

这种理解度或了解要透过将一事件视为较大情境的一部分，并且追溯它与其他构成该情境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来完成。当那个机械零件被视为缝衣机的一部分时就可以理解了。而把巫师的行为置于文化信仰与社会关系的情境中来看待时，也就一目了然了。这种形式的解释与史学家所经常采用的方式是极为相似的：

史学家与他的读者最初相逢时，似乎大半是毫无关联的一堆资料，而后史学家继续从揭露某些普遍的主题或发展上，指出其意义。

对于这种探究，崔德雷（Dray）写道：“解释的担子便是将这些部分综合到一新的整体中”。

一个人类学者所采用的文化观念与人类形象，将引导他对于资料的综合与如何看人类事件的意义。譬如说，有些人具有怀疑论的人类形象，便将个人行为从自私自利的动机来加以解释。个人被设想成为了他本身的利益，去运用和操纵他的文化规范。另一些人具有乐观论的行为观，则从对于道德价值的无私献身来解释人类行为。

一个人类学者所采用的文化观念，影响他如何编排他的资料，以及他如何作解释的方式。举例说，斯图尔德主要将文化视为对环境与生计因素的一个适应反应，在他对肖松尼人(Shoshone)印地安族的研究里，他将该民族的家族组织描绘为与实际利害有关。如果是本尼迪克，她将会以全然不同的眼光来看此制度。她不曾谈及肖松尼人族，但在她对其他社会的描述里，她将家族解释为与她所谓的文化模式，或整体形态有关。依她的观点，这是一情绪的主题，倾向于充塞一文化，并几乎可随意地依人类的生理需要自由改变。本尼迪克可能将肖松尼人族家族视为一“无理性”的文化特质，它相对于人的物质利欲而言，是较专断的。

我所涉及的了解的形式，即意义的解释，可与科学的解说加以区分，根据后者，一事件的发生是以一普遍概括的法则来说明。这两种解释形式的对照或许在考虑预测的问题时最为明显。科学的分析尝试建立一现象背后之因果因素，因此当必要条件存在时，即可预期该事件发生。科学的解释“将所要解释的对象包摄在普同的经验法则之下，使之具有预测性”。相反地，当人类学者在阐明一现象之意义时，并不产生预测的问题。原始巫术之例可借以说明，因为在该情况下，解释未必隐含这个特别的仪式将在何时再以此特殊方式来做，解释仅仅是要理解看似意义不明的个人行为。

人类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上寻求因果的、科学的解释也并非十分不寻常的。斯图尔德即是一例，他通常着重在文化生态的因素，以试图标出支配着文化历史的必要法则。然而，甚至当一个人从事这种科学的分析时，他可能对他所研

究的现象（纵令只是含蓄地）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解释而已。斯图尔德对肖松尼人家族的分析是一个例子。虽然斯图尔德尝试达到这制度发展背后的因果因素，由于他视这民族的家庭组织为一实用的而非专断的现象，他也给予了一个有意义的解释。他以某种眼光来描绘它，视它为与某一情境，而非另一情境有关。假如这因果面的描述完全从他的分析里剔除的话，他所描绘的肖松尼人族家庭为一实用的制度，这点仍将维持。我们还可以引述斯图尔德研究的其他未尝试因果的分析，而只致力于描述文化现象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他的架构也引导他以独特的眼光去看资料，以及以特殊的方式赋予其意义。

由于文化观念与人类形相之歧异性普遍存在着，故而两个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个人的行为，对那个人正在做什么可以意见相左。同样地，两个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种制度的辨识或评量也未必一致。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去揭开这些不同的学者在观察人类事件时所看到的意义为何。

描述与解释并非是完全客观的，因为它受到研究者用以理解他的资料的主观观点的限制。这个概念并不新，但其重要性必需加以强调。T·库恩(Thomas S.Kuhn)，这位科学史家曾有力地对此加以阐释。

根据库恩的观点，事实仅能放在一观念的或理论的情境里来看才能了解，而且这个情境如此重要，对于事实与理论的区分也就由于“极端人为而不自然了”。举例来说，三个不同的人可能说已“发现了”氧气，但是这个发现一直要到观念上

的改变已提供了观察气体的理念架构时,才能被充分地了解。库恩认为当一事实置于一理论内涵来了解时,若从某些其他观点视之,便不再是相同的一个事实。他写道:

从当代史料编纂的有利地位审视过去研究的记录,科学史家极可能宣称:当典范改变,世界本身亦随之改变。科学家们受着新的典范所引导,将采纳新工具与视察新的部位。而更重要的,在‘科学’的革命期间,科学家以熟悉的工具视察他们曾看过的部位,而看到新而不同的事物。这正好像这个学术专业社区已被突然输送到另一星球,在那里熟悉之物被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也就加入了不熟悉之物。

根据这个科学的观点,“事实”将永远不能被客观地证实,因为事实只能依安排此世界并使之可理解的主观的分类与观点来了解。站在一个与别人不同的理论立场,你在本质上,便研究一个与他迥然不同的世界。库恩举视觉统觉的变化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在此一个注视黑白图案的人可改变他的指涉架构,故而在前一瞬间为前景者,在后一刹那即转变为背景。科学家的主观观点引导他去专注在真实世界的某些特殊面上,而将其他面留做背景。

如果主观的观点对于人类学者如何解释他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那么这观点本身即成为首要的研究课题。有关像文化等抽象名词的意义的争论,在对于具体事实的了解上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章 反理性主义的兴起

——泰勒与博阿兹

在这一章中，我们要检视泰勒与博阿兹所构想的人类事务之意义。我特别将这两位学者放在一起讨论，以便强调他们之间的对照；他们分别代表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思想。泰勒的著作表现一种可称之为主知论与现代以前的文化观。而博阿兹则代表了反理性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与现代的行为观。比较这两位学者的概念，既可以显示本世纪之交发生在人类学思想上的变迁的重要性，又可在它们历史的内涵中指出这些思想的发展。

泰勒(1832—1917)

演化、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

进步一词适用于人类活动的领域的观念，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中心，但在19世纪上半叶，它似乎已经匿迹，直到六七十年代才得以全力复苏。这二十年是人类学发展成一门自觉、专门的学科的肇始期，而泰勒是它主要的创始人之一。这萌芽成长期中引起争论的新科学的中心焦点，亦即泰勒研